

宋代出版商如何打击盗版

保护知识产权,打击盗版,打击非法出版物,这是现代文化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活动,现代人为此付出很多努力,也付出很大代价,“道”与“魔”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那么,在古代有没有盗版活动呢?有没有为维护版权而进行的较量呢?

答案是肯定的。别忘了,印刷术这项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,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,有出版就面临与盗版的斗争,古人在这方面的不省心事,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少,现在我们去1000多年前的宋朝看看。

书坊： 《清明上河图》里 可找到古代出版商

据《广州日报》刊文,在印刷术出现之前,还不能说有严格意义上的出版业,书都靠手抄,因此在先秦两汉乃至魏晋时期,书都是奢侈品,“我遗子,唯一经”,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本经书,听起来轻巧,其实真是这么容易吗?非也,那时候留下一套书给子孙,如同留下一套豪宅。一本书的存在感比现在的书本强多了,司马相如给汉武帝上一篇文章,几千字装满了一马车,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。

科技,只有无所不能的科技,才能改变读书人的命运。先是纸张问世,接下来它的亲戚:印刷术,这个神技一出现,普通读书人眼前出现一道光芒。因为知识便于携带了,也变得便宜了,当然,抄书的人也失业了,当年班超投笔从戎,其实就是不想当抄书人了,他转型忒快,在印刷术出现前几百年就跳槽了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,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:出版业。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:出版商。

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行业在宋朝闪亮登场,它有一个实体依托,就叫书坊。它既有生产车间,又有销售门店。书坊作为新生的行业领头羊,到底有多牛呢?看苏东坡的记载就知道了。苏老师是读书人,当然会注意到书本的生产和流通情况,他在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里透露一个重要的行业信息:当时市面上有人印刷“诸子百家”的书籍,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?“日传万纸”,每天印刷量上万页。这是当时大宋的一线城市开封的生产情况。正因为技术上的突破,书本就能进一步普及,于是当时市面上的书本既多而且容易购买,“多且易致”,所以宋朝人格外有文化范儿,为啥?无他,只是因为知识更容易购买!

那么,印刷品的主要销售地点在哪里呢?北宋有个叫穆修的读书人也小小剧透了:在咱大宋的东京相国寺附近。“携入京相国寺,设肆鬻之”,原来,就在鲁智深看的菜园子附近。想当年,林教头和鲁智深之流的好汉,在相国寺的菜园子喝酒论武,而附近就是书香四溢的书市,奇妙啊。

如果仔细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还能找到开封的书坊,店主在柜台内,穿着深色衣。购买者在柜台外,着白衣。似乎正在讨价还价。



当时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,会标明出版商的坊号和地址。

宋朝的“二维码”： 坊号牌记和告白文字

既然有了出版商,那就得有广告,因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,北宋的出版商们在激烈的竞争中,如何让消费者记住自己,那就得有独特的标志。为了销量,为了市场,脑洞不大开不行啊。这个独特的标志就得印在书上,就如同如今的二维码,随时方便读者扫描,当然,现在用手机扫描,过去用眼睛扫描。

最流行的“二维码”叫作“坊号牌记”,是一个小标记,或者是一个小框框,里面印着说明文字,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,直接印着字。就跟现代的二维码相似,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。这字也不能太多,一行就够,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,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。如果你在北宋,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《续玄怪录》的玄幻鬼怪小说集,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,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:“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”。也就是说,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,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,地点就在太庙前。如果你觉得好,欢迎下次再来购买。

有时候,出版商还怕说得不够仔细,于是又会饱含深情地再在书尾加上一段告白,希望借此加强与读者、消费者的互动,告白的信息量更大,感情色彩也更浓。

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钱谦益,喜欢收藏宋版书,他为了心爱的女人柳如是,曾经卖了一套宋版书为其建豪宅。有一回,钱大才子翻阅一本宋版书《抱朴子》,居然发现一段50字的出版商告白,是南宋初年的,这条发自500年前的信息,读得钱谦益泪流满面。告白说:我们荣六郎出版公司,办公地点以前在东京相国寺的东面,因为大宋南渡,现在搬迁到临安府的瓦南街东,“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,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”,继续开印卖书。请各位放心,我们印刷的《抱朴子》仍然是东京的版本,保证质量,不会有半个字的差错,“无一字差讹”,各位亲爱的消费者,敬请光临,多多关照,“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,幸赐藻鉴”,还标明了日期。短短几行文字,见证了家国的兴衰,行业的发展,钱谦益结合自己当时的处境,不流泪才怪。

古人怎样维护版权： 向官府注册 上诉请求保护

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权,有版权就得申请注册,以得到官方承认,然后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,这种行业状态,在宋朝已经是家常便饭。

例如,在南宋时候的四川,有一家出版公司名叫“眉山程舍人”公司,该公司印刷了一套《东都事略》,在该书的书页上,就申明了版权,以及向盗版行为发出了警告,“眉山程舍人宅刊行,已申上司,不许覆板”。寥寥十几个字,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。换成现在的语言,就是说:该书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发行,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版权保护,严禁盗版印刷发行。

当然,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行为,不让非法之徒钻空子,有时候话要说得更详细明白,而且还要委托官府出面发表声明,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,并震慑盗版分子。

且说在南宋理宗年间,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出版机构的正当权益,防止盗版,专门为一家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,该公告说,市面上的《方輿胜览》《四六宝苑》这两本书,是“祝太傅”公司出版发行的,法人代表吴吉,本公司为这两本书,除了花了几年时间辛勤编辑之外,还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印刷,“今来雕版,所费浩瀚”。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进行盗版印刷,出售赢利,导致本公司“徒劳心力,枉费成本”,现在本公司将版权在有关部门注册,取得法律约束力,以杜绝盗版的行为,“合经使台申明,乞行约束,庶绝翻版之患”。原来,盗版在那时候叫翻版。

在严肃申明之后,还得将声明发到网上去,在当时也就是张贴在各处州县的交通要道,让大家都看得到。如果出现了非法出版情况,那么本公司就会请求有关方面毁坏盗版,追究其违法行为,以断绝这种盗版活动,“乞追人毁版,断治施行”。瞧瞧,宋代出版商的版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,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,有法律上的规范,而对于如何打击盗版行为,也有具体可行的步骤。根据这些信息,要说宋朝人的出版发行行业,已经相当完备,也不算过分。(刘黎平)



当时印刷业发达,每日可印上万页。

相差三十里的智慧

三国曹魏时期,魏国的东南是东吴,他们与东吴的防守前沿是合肥城。据《北京青年报》了解,当时合肥城南临大江,北与寿春相距又远,东吴看到合肥城这一弱点,所以,经常出动水军骚扰此城。而当曹魏派兵救援时,吴军已经占得了便宜,从水路撤走了。这样,吴军是经常困扰合肥,弄得魏军疲于奔命。一年一年过去了,年年山河如旧,没有一个人来想办法改变这一状况。

直到魏文帝青龙元年(公元233年),满宠被任命为征东将军,负责扬州一带的军事,

坐镇合肥。这个满宠是魏国的大将,极具韬略,《三国志》评价他是“立志刚毅,勇而有谋”。

满宠到任后,几经与东吴交手,他发现了这一弊端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合肥城问题,经过深思熟虑,他向文帝上书,建议把合肥城西移30里。因为那里有险可守,而且离江较远,一旦吴人前来攻扰时,必须弃船陆战,这样吴军便失去了水军优势,这利于魏军与敌作战。

就是这一个好计谋,却没人能领会。后来朝廷实在没有别的良策,这才同意了满宠

的请求,迁动合肥城。东吴见此情景,认为满宠因为恐惧而迁城,应趁其新城立足未稳攻下。孙权即率大军渡江,准备攻打合肥新城。临上船时,孙权得意地对臣下说:“不出数日,一定可以占据合肥。”

当孙权得意扬扬地抵达合肥新城时,不禁大吃一惊,再也不是往常的景象了,原来这座新城坐落在距江边很远的地方,而且依山而筑,即使没有援兵,孤城也可以支持数载。结果,孙权大军泊在江中,骑虎难下,攻又攻不得,撤军脸面过不去。

孙权的尴尬境地,都让满宠看在眼里。认为孙权会派军队到岸边炫耀,为自己下台阶。于是,满宠便布置了六千骑兵埋伏在城后。果然如满宠所料,吴兵数千上岸驰聚,他们突然发起冲锋,打得敌人措手不及,死伤无数。最后,孙权败师而归。从此合肥的困境得以解除。

合肥城移动了30里,魏军就占据了主动。30里的距离不远,可是人的智慧差距就大了,其结果迥然不同,对于战争来说,就决定了胜负,保住了江山。(刘永加)